

论《查理十二传》《哲学通信》与伏尔泰史学思想的形成

翟若朴^{1*}

(^{1*}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系, 湖北省 武汉市 430000)

摘要: 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奠定其历史学家地位, 而《查理十二传》与《哲学通信》对其意义重大。前者积累了史料方法, 树立了对伟大君主的评判标准, 激发了伏尔泰关注社会历史的动力, 后者明确了文化史要素与以文化为中心的评价标准。两书从实践与思想上为《时代》奠定史料处理方式、整体史的书写视角及理性主义历史观基础, 共同推动了伏尔泰史学思想的成熟。

关键词: 伏尔泰; 《查理十二传》; 《哲学通信》; 《路易十四时代》

Charles XII, Lettres Philosophiques and the Formation of Voltaire's Historical Thought

Ruopu Zhai^{1*}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00, China)

Abstract: Voltaire's *Le siècle de Louis XIV*, established his reputation as a historian, while *Charles XII* and *Lettres Philosophiques* were of great personal significance to him. The former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historical methodology and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great monarchs, inspiring Voltaire's interest in social history. The latter clarified the elements of cultural history and established cultural evaluation criteria. Together, these two works laid the practical and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for the treat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perspective of total history writing, and the rationalist view of history, collectively advancing the maturation of Voltaire's historical thought.

Keywords: Voltaire; Charles XII; *Lettres philosophiques*; *Le siècle de Louis XIV*

引言

伏尔泰历史学家的地位是由《路易十四时代》(以下简称《时代》)奠定的, 它集中体现了伏尔泰著史的特点与创新性, 是研究伏尔泰史学思想的钥匙^[1], 从 18 世纪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初, 伏尔泰对《查理十二传》(以下简称《查理》)、《哲学通信》(以下简称《通信》)以及《时代》的构思几乎是同步的, 这两部著作显然对“历史学家伏尔泰”的出现具有某种推动作用。对于伏尔泰向史学家的转变这一问题, 布鲁姆菲特与马克·里维埃指出, 伏尔泰著史重在道德训诫与传播启蒙观念, 因此这一转变实际上是其思想活动的结果^[2], 思想动态一旦落实到历史书写, 便展露为历史观, 因此他们也研究伏尔泰历史观或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 但对《查理》与《通信》的论述并不集中, 更多关注于传记史学《查理》。鉴此, 本文以《查理十二传》、《哲学通信》为切入点,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揭示其对《时代》的奠基意义, 进一步理解伏尔泰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

1. 《查理十二传》：历史写作的经验与教训

伏尔泰于1731年出版的《查理》是其史学生涯的正式开端。这部作品虽未完全突破传统传记的框架，却为伏尔泰积累了关键的史学实践经验，并推动其史学观念发生初步转变。

作为伏尔泰史学创作的首次尝试，《查理》延续了欧洲人文主义传记的传统，内容以查理十二的个人经历为核心，佐以道德训诫。伏尔泰一贯不以想象力著称，历史才是他创造的活水^[3]，而《查理》恰好释放了他取材历史的禀赋，故而这部书被打上了很强的文学烙印。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瑞典、莫斯科大公国的社会速写^[4]，虽未独立成篇，却是对超越政治军事史的难得尝试。不过，《查理》的创新程度仍然有限。正如布鲁姆菲特所云：它在本质上还属于人文主义史学，伏尔泰还没有摒弃这一传统，亦未去阐释他自己的新方式^[5]。它终究距离伏尔泰所开创的社会史、文化史还很遥远^[6]。

《查理》的写作过程，是伏尔泰应用史料的探索与积累过程。一方面，他首次系统性探索了口述史料的收集与应用方式。因传主查理十二的故事最初源自其宠信法布里斯的口述^[6-2]，伏尔泰意识到亲历者记忆的价值，随后通过跨国书信等方式，向更多亲历者征集口述资料。譬如他曾向友人写道：“我希望布朗卡斯先生能就他所了解的已故瑞典国王的相关细节为我指点。但关于那段历史，还有更多值得探究的趣事，我恳请您务必帮忙打听一下”^[7]。《查理》成书的最后阶段离不开这种以信访补充文献不足的方法，这段经历以后，他便对处理口述史料游刃有余了^[8]。另一方面，《查理》的写作也暴露出他对文献史料的处理尚不成熟。伏尔泰有时过度依赖二手资料，在创作《查理》时，部分内容直接照搬利米耶的记载，即便他也在努力收集一手证词，不过整体资料水平未达博学党史学家的要求，他一开始也不热衷广泛征引文献，对标注文献出处也不积极，导致不断有人质疑内容的可靠性^[9]。伏尔泰以笛福1720年出版的《瑞典战争》为参考，但该书错漏百出，伏尔泰不仅沿袭其错误，还为笛福辩护，称这是真实的证词^[9]。这些教训对历史学家伏尔泰的成长至关重要。批评者对史料真实性的质疑，推动他在后续写作中树立辨伪的原则。正如在《时代》中，他明确提出：“反驳公众意见的人，必须是目睹者，并且是开明的目睹者，并必须证明自己的见证准确无误”^[10]，这正是对《查理》教训的回应。

《查理》的写作不仅积累了技术经验，更推动伏尔泰的史学观念发生关键转变。首先是对历史书写的内容。经历论争，伏尔泰对《查理》受到的吹毛求疵感到耿耿于怀，他将原因归咎于现有史学研究视野过于狭隘，由此伏尔泰开始看重社会范围内的历史，特别是与人们日常相关的事物，诸如艺术、科学、技术乃至文明间的差异，而不仅满足于《查理》所涉及的内容。1735年伏尔泰向友人发泄他对现有历史叙述的极端不满：“连接两海的运河水闸、普桑的画作、一部精彩的悲剧……这些事物比所有的宫廷编年史和所有的战地报告都要珍贵千百倍”^[6-4]。这段文字记录了伏尔泰重塑史观的真实体验，他显然决心扩大自己的写作视角，既非围绕国王，也不局限在宫廷和战场，而是走向人与社会。显而易见的是，其思考成果在《时代》与《风俗论》中得到了精彩的展现，伏尔泰在写作《时代》时仍然讨厌记录细枝末节^[5-2]，而热衷于讨论反映精神面貌的事物，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写作缘起大概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

其次，历史观的转变集中体现在对历史人物尤其是君主的评判标准上。查理十二以穷兵黩武著称。在《查理》最后一章，伏尔泰对传主有一番定论：“他主要是个特立独行、举世无双的人，而不是个盖世无双、崇高伟大的人。他是个令人倾倒赞赏的人，而不是个值得效法的人。他的一生应该教导国王们，让他们认识到，一种和平而幸福的统治，远远高于纷至沓来、不胜枚举的光荣”^[4-2]。这番评价的实质在于否定了战功与个人魅力为主导的评判标准，转而要求以君主的统治实效为准。与之相对，其敌手彼得大帝虽更甚于剥削人民，但他作为立法者和技术专家统治他的国家，为了使俄罗斯文明开化，彼得在财政有限的情况下，兴建堡垒、要塞和办公场所，重金招揽外国专家、设立科学院，号召贵族青年出国留学，把外国风尚带回祖国，还计划开通运河、商路，努力提高俄国的商贸地位^[4]。伏尔泰尽管对他的暴虐统治嗤之以鼻，但仍承认“在别的国家，各种科学经过长年累月的劳动早晚结出的果实，由于沙皇彼得的关怀照顾，尽善尽美地来到他的各个邦州”^[4-4]。彼得创造了一个新兴的俄罗斯，瑞典却在查理十二以后荣光尽失。伏尔泰意识到，伟人不该汲汲于战争而应善于治理。从历史观上说，伏尔泰已经确立了评判君主的基本立足点——和平统治而非征服带来的荣耀。这种理性主义的评判标准促使他思考理想的君主及君主制、国家的作用，在写作《查理》时“路易十四史的概念已萦绕在他的脑海中”^[5-3]，所以《时代》延续

了这份思考。因为路易十四时代更加战火朝天，而他亲历了这一时代悲惨的结尾。伏尔泰的理性主义使《时代》注定会呈现双重面貌：在战火中走下神坛的路易十四，在文明史中保持骄傲的法兰西。

2. 《哲学通信》：文化史的萌芽

如果说《查理》是伏尔泰在实践层面试炼了著史方法，那么 1733 年出版的《通信》则在思想层面为其注入文化史的灵魂。这部以英国见闻为核心的作品，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却明确了理性主义时代的两大标志：一是学术与科学的发达，如牛顿的物理学、洛克的哲学；二是开明的社会环境，如英国的宗教宽容、对学者的尊重。这两大要素成为他日后书写文化史的核心内容。

《通信》重构了伏尔泰对历史伟人的评价标准，引入文化的视角，奠定了《时代》文化史书写的思想基础。《查理》提出君主应和平统治的评判基础，《通信》则聚焦笛卡尔、牛顿、洛克等学者，将其定义为“真正伟大的人物”。他认定，政治家和征服者每个世纪都有，他们不过是鼎鼎大名的坏蛋^[11]，并直言道：“我们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12-1]。这一论断是对传统史学价值逻辑的颠覆，伏尔泰不愿再将征服者视为真正的伟人，而是用文化创造者（学者、科学家、思想家）取代了前者的地位。在他看来，真理的生命力是无穷的，一部作品要比一场战役更伟大，文化比政治、军事更重要。这种评价尺度的革新，直接影响了《时代》的写作。基于对文化的重视，伏尔泰明确了“伟大时代”的定义。他在《时代》中提出“四个伟大时代”的说法，并指出文化进步是伟大时代的绝对标志^[10-2]。这一结论的思想源头正是《通信》，书中对英国文化繁荣的观察，让他意识到文化成就而非军事扩张，才是时代伟大性的终极证明。论及路易十四，伏尔泰曾表示，路易十四是一位伟大的国王，其根据不在于他的征服与胜利，而在于他吸引了众多有能之士来到法国，在于他在各个领域都鼓励学者并对诸伟大艺术家予以回报，在于他发起了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和探索项目，在于他建立了如此之多的设施，在于他使法语变为通用语言^[5]。因而他认为，在他笔下，路易十四的成功，远非武功，而是文治。在写作《时代》的时候，他以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哲学家作为一个辉煌时代的证明，并强调路易十四对文化事业的贡献，从而创造了讴歌开明君主专制的文化史章节。

《通信》还推动伏尔泰的史学视野从单一国家转向跨国比较，推动了《时代》中泛欧化文化史书写的出现。书中虽然以介绍英国事物为主，但隐含英、法两国的文化、政治与经济比较。在讨论商业时，他以英国为例，证明经济利益是国家实力的核心驱动力，讽刺法国漠视发展商业的短视^[12-2]；在分析学术发展时，他对比牛顿受到国葬与笛卡尔死在异国他乡的境遇，揭示自由环境对文化的影响^[12-3]。这种比较视角被《时代》继承并拓展。《通信》的地域范围限于英国，而《时代》涵盖大半个欧洲；《通信》基于个人见闻，《时代》围绕路易十四统治展开；《通信》强调文化的重要性，《时代》则进一步解答文化发展的动力，如开明君主赞助文化事业。可以说，《通信》是《时代》跨国文化视野的雏形。《通信》的底层逻辑是主张进步的理性主义，它要求人们各取所长、美美与共，不可恪守偏见。伏尔泰虽夸赞英国的宗教自由、学术氛围，却并非绝对亲英，他书写英国事物，是为了努力将它的自由风气传播到法国去^[13]。正如他所说，“对思想家而言，没有法语，没有英语；凡教导我们的人都是同胞”^[14]。这种文化互鉴理念为《时代》解决了一个关键矛盾：如何协调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文艺崛起与英国科技、哲学发达的事实，伏尔泰的答案是将英国文化成就纳入“欧洲文化统一体”，强调法国对欧洲文化的整体推动作用^[15]。这种世界主义视角，正是《通信》理性主义思想的延伸。

3. 两部作品对《路易十四时代》的奠基意义

《时代》使伏尔泰真正跻身史学大家之列，无疑最能体现其史学思想。《查理》与《通信》虽各有侧重，但与《时代》的创作具有重大关联性，共同推动伏尔泰的史学思想走向成熟。前者积累了史料方法，树立了对伟大君主的评判标准，激发了伏尔泰关注社会历史的动力，后者明确了文化史要素与以文化为中心的评价标准。二者各从实践与思想两重境界，为《时代》的创作提供了经验。

第一，史料方法的继承与升级。《查理》的口述史料收集经验，在《时代》中发展为系统的

史料处理原则。伏尔泰延续了口述加文献的史料构成,通过宫廷知情者获取路易十四的轶事,以回忆录等材料验证史实,并明确提出要用不同史料验证的原则,他指出,如果两个互相敌视的人都肯定同一事实,那么这一事实便无可置疑,相反,当他们谈论的内容互相矛盾时,那就必须加以质疑,要再考察其他人的记录以辨别真伪^[10-3]。这正是对《查理》中偏信一文的反思。

第二,写作视角的丰富。《查理》中社会速写的碎片尝试,与《通信》的文化史倾向,在《时代》中整合为整体史。他从宏观视角出发构建了整体性兼分析性的书写框架,雅克·勒高夫评价道:“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这是有演进的、变革的运动着的历史,不是停滞的、描述性的历史;是有分析的、有说明的历史,而不再是纯叙述性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16]。在这种整体史的叙述框架下,伏尔泰既叙述路易十四的统治政策,也分析战争对国家的影响;既梳理艺术科学的成就,也探讨经济、宗教对社会的作用。这种整体视角的形成,与《查理》、《通信》奠定的实践与思想基础息息相关。

第三,历史观的定型。两部作品的思想成果,在《时代》中凝结为成熟的理性主义历史观。伏尔泰融合《查理》的统治贡献论与《通信》的文化价值论,形成双重评价标准:延续对查理十二穷兵黩武的反思,对路易十四,既批判其盲目扩张,又肯定其对文化的赞助;对时代,以理性主义为标尺,同时强化对社会整体面貌的考察。伏尔泰深信是精神在指引大众,因此人类历史只能是人类精神的历史^[3-2]。所以伏尔泰没有按照时间顺序将文艺、政治、军事等内容混同叙述,而是按照分析的层次,将政治、军事、外交和财政、商业、司法、制度以及科学、文化、艺术拆分各章,以此彰显不同事物的重要性,在这种编纂方式之下,最顶端的是文化成就,它构成了时代真正的顶峰。联系各章节的纽带则是路易十四的统治。伏尔泰试图为路易十四的统治披上理性主义的外衣,因之声称后者向往“一套超越一般政治与偏见的哲学体系”^[10-4],作为开明专制的支持者,伏尔泰所倡导的启蒙路径是自上而下的——理性必须首先在首要人物头脑里确认,然后逐步下达,最后主宰百姓^[10-5]。这种为启蒙而著史的理性主义史学观遂成为《时代》的重要特征。

参考文献:

- [1] 研究《路易十四时代》的代表性成果可参见 Marc Serge Rivière, *A Study of Voltaire's Le Siècle de Louis XIV*, Glasgow University, 1980; J.H. Brumfitt, *Voltaire Historian*, Glasgo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Ch. Rihs, *Voltaire: Recherches sur les origines du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 Geneva: Droz, 1962; Karen O'Brien, *Narratives Of Enlightenment: Cosmopolitan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Gibb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David Morgan, *Sources Of Enlightenment: The Idealizing Of China In The Jesuits's Letters Édifiantes And Voltaire's Siècle De Louis, Romance Notes*, Vol. 37, No. 3, 1997, pp. 263-272; J. Quignard, *Un Établissement de texte: Le Siècle de Louis XIV de Voltaire, Les Lettres romanes*, vol. v, 1951; Síofra Pierse, *Voltaire Historiographer: Narrative Paradigms*,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08; John Leigh, *Voltaire, a sense of history*, SVEC, 2004.
- [2] 参见 J.H. Brumfitt, *Voltaire Historian*, Glasgo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Marc Serge Rivière, Marc Serge Rivière. *The Age of Louis XIV: Voltaire's Coming of Age as a Philosopher/Historian*, *LiNQ*, 1995, 22(1): 78-90.
- [3] 勒内·波莫. 伏尔泰[M]. 孙桂荣、逸风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72, 74.
- [4] 伏尔泰. 查理十二传[M]. 吴模信, 吴煜幽译. 商务印书馆, 2016: 1-26, 22-25, 24.
- [5] Marc Serge Rivière, *A Study of Voltaire's Le siècle de Louis XIV*, Glasgow: University of Glasgow, 1980, pp. 517, 25, 10, 138.
- [6] J.H. Brumfitt, *Voltaire: Histori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16, 10, 17-21, 46.
- [7] Theodore Besterman, *Voltai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Chicago press, 1976, p. 160.
- [8] Ragnhild Hatton, *The History Of Charles XII*, translated by Antonia White. London: The Folio Society, 1976, pp. ix-xxv.
- [9] Síofra Pierse, *Breaking Away from Battles: Voltaire and the Everyday in History, Eighteenth-Century Ireland / Iris an dá chultúr*, Vol. 24, no. 1 (January 2009), pp. 84-99.
- [10] 伏尔泰. 路易十四时代[M]. 吴模信, 沈怀洁, 梁守锵, 等译. 商务印书馆, 2018: 294, 1-2, 336, 411, 107.
- [11] 陈乐民. 敬畏思想家[M]. 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社, 2014: 195.

- [12] 伏尔泰.哲学通信[M].高达观, 徐仲年, 王燕生, 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56, 48-50, 71.
- [13] Norma Perry, Voltaire's View Of England,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vol.7, no.26(June 1977),pp.348-354.
- [14] Dan Edelstein, Biliana Kassabova, How England Fell Off The Map Of Voltaire' s Enlightenment,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Vol.17, no.1(March 2020), pp.29-53.
- [15] David A.Bell, *The Cult of the Nation in France: Inventing Nationalism, 1680-1800*, Cambridge, MA, 2001, pp.93-94.
- [16] 雅克·勒高夫, 皮埃尔·诺拉, 罗杰·夏蒂埃, 等.新史学[M].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19.

(校对: 范记川 排版: 袁骁)